

地方性與同理心： 後疫情時代的人類學田野筆記

簡美玲*

一、前言

2019 年至 2020 年，人類社會經歷了近世紀以來，又一巨大的考驗。如此微小的新冠病毒（COVID-19），所帶來的鋪天蓋地的疫情，改變了我們的日常，與我們如何的相互觀看，如何重新瞭解自己與他人，以及人我之間的關係。雖然科學家的努力，疫苗的研發，與即將量產的訊息，為暗夜與困頓裡，帶來一絲曙光與希望，然而我們所期盼的，回到從前——自由的跨出島嶼，跨越亞際、洲際，進行各種交流、移動、行旅、商務、探親——在即將進入 2020 年尾聲，還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天光。我們所共同經歷的後疫情時代，有如一個人類學家，孤獨走入漫漫長夜與白日，無止境交疊的田野。

猶記起 COVID-19 疫情初起，人在東瀛的我，即將結束京都大學半年訪學之際，仍感受到京大吉田校區附近，平靜如常的氛圍。東大路街頭、鴨川河畔，偶見戴上白色口罩的京大生騎車而過。惟百萬遍古寺旁超商店家的口罩專區，已經空盪盪。無聲無息透露著風雨前的寧靜，而即將到來的風雨之疾，遍及地方與族群之廣，始料未及。

2020 年初春的武漢封城，尤掀起巨大震撼。眾生以為，那是極特定的區域性，通過無遠弗界的傳媒之力，一起凝視著武漢。怎料得，爾後，封城，將在世界多處的城市與地方，此起彼落。無論何處，城外的人，如何想像與同理城裡的人，我們的心情該如何提起與放下。2020 年 2 月 14 日，我以詩句，為人在武漢城內的人類學前輩師長，寫下了我的心情。面對巨大殺傷力的微小病毒，平凡卑微如我，僅能將同理心化作行動，為城內的師長與友人，以及勇敢生活的每一個人，而寫（簡美玲，2020）。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科技部人文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召集人

等待花開滿枝頭 簡美玲

走過十六年的軍旅

知青下鄉，文革，與苦難

在這場病毒之戰，你如何度日

恐懼與坦然間，怎麼安頓身心

不能晨跑了，振筆疾書的意義，可依舊？

「我們還好，都在家裡，不出門。」

這樣的光景，沒人想多說什麼

你的電郵，簡單幾句，我讀懂那背負著沉甸甸的無奈

一天，二天，三、四天

日子就這麼過了

無人知曉，隧道盡頭，有無天光

微小病毒迅速複製大時代的眾生，愁困

空氣，不再若有似無

它化身巨大無邊的長城

日常與非常同體

白日無異暗夜

佇立城外

我仰頭凝視高牆

安靜穿戴冷白口罩

溫潤水氣

幻化而出

穿牆而入

與你同在

苦你所苦

等待武大校園，花開滿枝頭的春天來臨

想起，你書中自題詩句：

為何晚風吹拂的時光

再無那愜意的涼爽

二、地方性

人類社會始於洞穴、家屋、部落。人們圍著洞穴裡的微小燭火，在亙古的暗夜裡，訴說著古老的物語。COVID-19 疫情，衝擊了實體的全球化，與無邊無際的移動力。在空間上，退守家屋與地方。曾幾何時起，移動與發展，有如王道；固著於地方，無異於保守。疫情讓我們的身體、心情，與心靈，重返家園與地方。在不能往外走的時局裡，日常如何安頓？生活如何豐富與再起，我們擁有更多時間，保留給家人，保留給自己。也多了時間，留給我們所在的地方。田園鄉間，小小一方土地，細細耕耘出豐美的瓜果。那也是撫慰人心的一方田土。此時想想，陶淵明式的生活哲學與態度，也許是後疫情時代，等待未來的翻轉，一個人生過渡時期的積極策略。

然而，不是每一個地方、社群、家庭與個人，都如此幸運。人類社會經歷了國家化、全球化市場鏈的繁複連結。疫情嚴峻緊張的時期，有人因鏈結的中斷、停擺，被迫離開職場，失業，乃至失去健康，與家庭和諧。後疫情時期的人生功課，需由生命的底層與生活的絕望再起。由個人、家庭，到地方，重新編織成一個有生命力的網。回到地方，從新、從心認識與行動於地方，開展地方社會的韌力。有如走入地方，進行田野的人類學研究者，以全視與全貌的觀點，以深描地方作為耕耘、駐紮小宇宙 (Geertz, 1973, 1983) 的行動，來構築一個更多層次、細節與生命力的地方社會。讓回到地方，成為疫情之後，自然與人文，得以永續的根底。

三、同理心

微小的病毒 COVID-19，所引發如洪流般的巨大疫情，衝擊無數文化與族群的差異。文化相對性的觀視，變得何其渺小。惟疫情之前與疫情之後的人類社會，也彷彿進入兩個不同的世界。量體溫、穿戴口罩出門，已成日常。諸多生活的安排，必須異動、延後與等待。人生以為的康莊大道，瞬間化為分岔的曲折小徑。有如人類學家進入田野，面對他者的理解，不僅是文化觀點的調整，更是心情上的調整與同理。也如文前詩句所述：「佇立城外，我仰頭凝視高牆。安靜穿戴冷白口罩。溫潤水氣，幻化而出。穿牆而入，與你同在，苦你所苦。」後疫情時代，如何在情緒情感上，感同身受，相互理解彼此的困頓，是更為重要的課題。

COVID-19 疫情所帶給全球人類的創傷與險境，讓我聯想到人類學家在田野所遭遇的創傷與政治險境。通過不同社會與不同階段危機的情緒經驗，人類學

家探討政治與個人間緊密關聯的細節。而在產出民族誌知識與置身政治掙扎的同時，也突出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所共享的主體空間，以及相互介入彼此的生活（簡美玲，2015）。例如 Ghassan Hage（2005: 129-154）曾細膩地探討 2005 年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後，他所感受到一股反以色列的憤恨氛圍。Hage 以「政治的情緒」來呈現他與報導人所共同體驗的情緒，並以 emotive imagining 重新解釋 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想像共同體。Hage 以黎巴嫩人對於國家與國族的情緒經驗指出對於國家的認同，不是抽象的想像，而是具體的情緒與情感想像。Hage 也對「參與觀察」提出修正的觀點。他認為要在危險的政治環境裡進行參與觀察，是處於情緒參與、分析參與，以及政治參與，三種參與類型間的相互協商。Hage 說，這是一種「民族誌的搖擺」。Elisabeth Hsu（2010: 155-170），以及 Lindsay Smith 與 Arthur Kleinman（2010: 171-179）也以民族的書寫，探討人類學者通過個人情緒與政治經驗，理解與再現中國的當代處境與變遷。呼應 Hage 所稱之情緒的參與，Hsu 面對的是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及此事對她在田野過程中，所引起的重大情緒挫折。相對的，Smith 與 Kleinman 的文章則呼應 Hage 所稱之政治參與。Smith 與 Kleinman 以細膩的民族誌寫法描述如何介入他者，以及由此所衍生之棘手的政治處境。他們認為這種介入並非來自倫理或分析上的決策，而是源於同理心與人性所展現之情緒和情感聯結。

好幾世紀以來，理性、科技、經濟，以進步與文明發展為生存與努力的哲學，幾已成為人類社會普世的存在價值。疫情之前，這樣的基本信仰，我們堅信不疑。疫情之後，方知那是何其脆弱。是個人與人類文明集體的脆弱。我們仍然需要科技，就如科學家對疫苗的研發及施打，為困頓的疫情，帶來一線希望與暗夜裡的曙光。雖然我們還在等待，但在內心底處，相互的同理與同情，仍是後疫情時代，最為珍貴的處世之道。

四、結語

人類學以最遠的田野，反思最近自身的文化與日常。疫情所帶來衝擊，跨越洲際，影響與威脅廣大地區與不同族群的人類生命。疫情讓我們反思，在日常的情境裡，時間與空間被迫轉變，身體與生命的脆弱。疫情讓我們了然，人與人，社群與社群，是如此緊密的鑲嵌在一起。疫情也讓我們反思，巨大的全球網絡，與細密的地方性，是如此複雜的進行著辯證與對話。回到個人，後疫情時代的生命處境與自處之道，也因而需要更深的反思性，與對人我，對家園及他方的同理與同情。

2020/11/26

參考文獻

- 簡美玲 (2015)。〈人類學與民族誌書寫裡的情緒、情感與身體感〉，刊於《身體感的轉向》(身體與自然叢書系列)，余舜德編，頁 129-163，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簡美玲 (2020)。〈等待花開滿枝頭〉(未出版之詩文初稿)。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ge, Ghassan. (2010). Hating Israel in the Field: On Ethnography and Political Emotions. In *Emotions in the Field: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Fieldwork*. James Davies and Dimitrina Spencer, eds. Pp. 129-1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Elisabeth. (2010). Tian'anmen in Yunnan: Emotions in the Field during a Political Crisis. In *Emotions in the Field: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Fieldwork*. James Davies and Dimitrina Spencer, eds. Pp. 155-17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Lindsay & Arthur Kleinman. (2010). Emotional Engagements: Acknowledgement, Advocacy and Direct Action. In *Emotions in the Field: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Fieldwork*. James Davies and Dimitrina Spencer, eds. Pp. 171-17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